

总 第 六 十 辑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经济学家茶座



NLIC2970906026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经济研究的问题意识 / 朱富强

笔者常自嘲是“无可救药的理论思索者”，十多年来“躲进小楼成一统”，写下了近千万字的系统理论著作。期间，除了梳理和比较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经济学各流派的经典著作外，也常常浏览《经济学家茶座》并为之写一些感悟性短文，却很少在意国内那些经济学专业刊物。这也许令一些学界同仁很是不解：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学人怎能不关注经济学专业刊物呢？专业刊物上的文章体现了理论的前沿呀！这就涉及理论研究的本质。

其实，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来自人伦日用又高于经验事实，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揭示其本质，这就是冯友兰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此，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显然，经典著作和《茶座》之间的共同点就是，两者都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这恰恰是专业经济刊物所欠缺的。

同时，问题意识包括现实问题意识和理论问题意识两大方面。其中，前者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注重理论的解释力；后者是对经济理论问题的反省，涉及理论的逻辑性。显然，问题意识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和高超的智性能力，同时又具有包容性的学术态度和多元化的学术思维，从而能够跳出常规范式的桎梏，从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反思既有理论。

正是通过对大量经典著作的长期耙梳，笔者注重多元思维和方法的交叉，注重各学科和各流派的知识契合，走上了问题导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道路，并通过各学科和流派间的相互诘问来深化理论认知。同时，《茶座》文章所记载的大量社会经济现象成了笔者现实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茶座》文章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则拓展了笔者的思维和认知。

与此不同，目前经济学专业刊物的文章却具有强烈的方法导向，主要是在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作细枝末节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并形成了提出问题、文献综述、建立模型、理论推导或经验检验的八股格式。同时，方法导向式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往往不是源于理论本身的逻辑或者见微知著的现实，而主要来自其他文献，这种基于单一思维体系所自我繁衍出来的问题往往只是个伪问题。

因此，笔者衷心祝愿《茶座》继续弘扬经济学的问题意识，不仅对经济理论的普及作出贡献，而且为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启迪。



经济学家茶座

总第六十辑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 方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荆林波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特约编辑

朱庆民 李淑娟

特邀执行主编助理

雒亚龙

卷首语

朱富强 经济研究的问题意识 / 001

学界万象

荆林波 经济学家的出场费 / 004

王梦奎 《内部未定稿》漫忆 / 007

蒲勇健 “外来和尚会念经”背后的经济学 / 013

国是我见

俞炜华 王长龙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的师生问答(一) / 016

高广春 屈杰 银行被房地产业绑架了吗? / 021

汤铎铎 牵牛鼻子还是抬牛腿? / 026

陈 宪 为什么是“城镇化”不是“城市化”? / 028

谢明干 深化改革:阻力在哪?从哪突破? / 033

孙文凯 男女收入差异来源探讨 / 037

学问聊斋

王 军 经济学家眼里的不朽 / 041

吴大新 亚当·斯密在德国:从“斯密之惑”到“艾哈德之解” / 046

刘宝宏 经济学让人更自私吗? / 051

谢作诗 我们要教给学生什么样的经济学? / 056

李海舰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 058

皮建才 经济学里的“模型悖论” / 062

韩朝华 董桥文论与翻译杂谈 / 066

生活中的经济学

史晋川 红灯·黄灯·绿灯
——交通法规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 070

张清津 说谎的社会成本 / 075

李俊慧 从生活小事中学习经济学 / 078

经济随笔

黄有光 金融为何重要? / 082

- 胡 巍 捕鱼者说之赋税篇 / 085
 詹宇波 美丽的九寨沟, 坑爹的九黄机场 / 090
 郭梓林 理性、幸福指数与三头六臂 / 093
 刘福寿 在天使“变脸”、“医闹”升级的背后
 ——外行看医患关系中的制度、技术、人 / 096
 王信东 漫谈消费者创造产品价值 / 100
 冯 伟 民间技艺失传、地域文化断层与全局社会趋同 / 105

经济评论

- 孙国茂 创新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唯一出路 / 110
 庞瑞芝 “老字号”该不该拯救 / 118
 高明华 企业家能力评价之我见 / 123
 刘慧勇 善用债者盛, 喜藏钱者衰 / 128
 胡怀国 破解“看病难”与“看病贵”难题:
 一种纯理论“遐想” / 130
 聂辉华 党力 唐志伯 北京为什么实行
 无效率的车牌摇号政策? / 135

财经阅读

- 胡春田 一本特色鲜明的通识类选修课经济学教材 /
 ——评俞炜华、赵媛的《社会问题经济学》
 李文溥 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
 ——读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 / 144
 熊秉元 读栗庆雄教授《遍栽桃李两岸春》 / 149
 管廷全 刘静忆 经济问题的描述与逼近定律 / 150

经济学家

- 刘汉民 哈斯商学院里的经济学家
 张友仁 你们不要, 我要! / 156

他山之石

- 王宏森 当“中国节俭”遭遇“美式浪费” / 159
 梁平汉 制度与国运: 西班牙历史的沉思 / 164
 祝曙光 雾里看花的俄罗斯经济 / 169

- 新兴 “第二届中国公司金融论坛”在济南召开 / 1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60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978-7-209-07196-3

I. ①经… II. ①金… III. ①经济
 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第083518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12

il:chazuo4901@126.com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 (0531) 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11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 18.00元



经济学家的出场费 / 荆林波

经济学家的出场费是多少呢？

按照公关公司的说法，在 2006 年之前，国内经济学家的出场费几乎都在万元以下，3000 元至 5000 元就能请到国内较知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国内经济学家因 2006 年、2007 年的大牛市而走红，又因随之而来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身价倍增，出场费一路上涨，三年上涨了 10 倍！

（《经济学家出场费 3 年涨 10 倍 郎咸平 1 场超 12 万》，羊城晚报，2009 年 6 月 17 日。）2009 年网上曾公布过一份《经济学家出场费一览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名列“三甲”。其中，郎咸平以 12 万元居首，即使垫底的水皮也在 1 万元以上。当时，我在香港出访，香港的朋友问我：有没有搞错？我说：差不多。

如今，真实的情况是，一位我熟识的经济学家的报价是，40 分钟 8 万，往返飞机头等舱，五星级宾馆。这种报价是否合理呢？我认为具体分析之后就可以知道其合理与否。

经济学家的出场费是如何制定的呢？

第一，机会成本。这是经济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用到经济学家身上十分恰当。经济学在中国目前仍然是显学，因此经济学家处于短缺状态，尤其是知名经济学家炙手可热，你不接受报价，自然有接受报价的！目前，最牛的仍然是巴菲特午餐，即与股神巴菲特在纽约知名的牛排馆共进午餐的活动。该活动从 2000 年起每年拍卖一次，并从 2003 年起转为网上拍卖，所得善款全部捐给慈善机构。2012 年，巴菲特第 13 次午餐拍卖落锤，最终以 345.67 万美元（人民币 2184 万元）的价格成交，较 2011 年创下的 263 万美元纪录，大涨 31%，成为目前历史上最贵的午餐。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否有如此昂贵的午餐呢？我们目前只有一个类似的版本，即山东德州商人陈雷以 45 万元拍下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的 3 小时，2013 年 1 月 16 日，任志强在北京请陈雷一家四口吃了火锅，之后聊天 3 个小时，双方对此均表示满意。

第二，时间。单纯从上面的例子来看，好像是 40 分钟就赚取了 8 万元。其实，

真是的状况不是这样。对于去外地而言，来回去机场的等待时间，加上飞行时间、机场延误时间、酒店接待时间、外地滞留住宿时间等等，往往外地邀请方越热情周到，经济学家损失的时间越多。即使是在北京演讲，如果交通不便，搭上的时间也不少。当然，也有幸运儿在同一个酒店串场，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的。

第三，知识的价值。娱乐圈的报价大家都感觉到瞠目结舌，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在成名前的出场费从几千元到几万不等，而成名后的出场费飙升到几十万。我们可以说，娱乐无价，同样，我们也要说知识的价值不可小觑。众所周知，农业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土地，工业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劳动力与资本，知识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是知识，所以，掌握知识的知本家将取代资本家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

第四，品牌的价值。经济学家是经济学者的佼佼者，因此，定价中要包含品牌的溢价。一般经济学者的演讲费3000元、5000元而已，而到了知名经济学家就要再加个零，原因在于他们的品牌价值。而这种品牌的溢价往往给论坛带来正效应。某某经济学家要来演讲，其受众会增加，主办方受惠于著名经济学家的到场，而不是受累于经济学家相对高的出场费。

第五，权威与影响力。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可能从来没有想到，中国市场

是如此之大。目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在中国的报价大约在20万元人民币。当然，也有些诺贝尔经济学家是低价出演，甚至是免费友情出场，而被各类中间机构盘剥了其中大部分。

这里必须提及一个重要的环节：经济学家的出场费是谁报出来的？是经济学家自己吗？恐怕非常少，多数情况下是其所所谓的学术秘书，甚至更多的是各类中介机构。大多数经济学家脸皮薄，没有受过厚黑学的训练，无法报出上述的价格，而只好让他们的学术秘书去打理这些事务，这也说明经济学家日益职业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经济学家助理或者学术秘书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职业门类。

学术秘书如何为经济学家谈加价？除了上述正常的报价之外，存在着各类可能的加价因素：

其一，节假日加价。因为损失了经济学家与家人的团聚，对家人欢聚的补偿需要在报价中体现。

其二，异地加价。尤其是去偏远的地区或者交通不便利的地方时，更是更有异地加价。

其三，网络价值附加。经济学家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可以影响某些决策，引导某些资本投向，嫁接核心媒体。有的时候邀请方特别提及经济学家的此类决策影响力。

其四，行政级别附加。现在中国有一



个不好的风气，就是经济学家也要看行政级别，不同级别的学者有不同的价格。部级的、厅局级的，不同的行政级别，有不同的级别补贴。

其五，旅行附加。主要指红眼飞行或者汽车长途跋涉的辛苦补偿。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家也是人，不是赚钱机器，如此报价要的是面子，不纯粹是票子。经济学家可以友情出场，为朋友也可以两肋插刀，免费出演。要防止的是：可恶的那些会议的主办方有钱而对经济学家无情，装疯卖傻，践踏经济学家底线。我曾经听说，某著名经济学家在演讲后，主办方给他 3000 元演讲费，这位泰斗级的学者，非常含蓄地说：“你们留着打的用吧。”

话说回来，经济学家也有要钱不要脸的。有的虚报价格，盲目攀比；有的靠刷粉来扩大所谓的社会知名度——这种互联网的手段越来越被某些经济学家发挥到极致；也有甩大牌的，尤其到某些地方演讲时，以为自己可以无所顾忌，说大话，殊不知，互联网时代，大家一会都知道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如果某些经济学家喜欢低价倾销，该如何看待呢？扰乱了市场价格，违背了市场定价机制？只能让他自己承担定低价的损失了。

各位“茶客”，请切记您的报价也是我们彼此心知肚明的！别违规出牌报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内部未定稿》漫忆 / 王梦奎

我196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报考本校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被录取。后来没有读成研究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持证报到后才知道，是到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内部未定稿》工作，行政编制在《红旗》杂志社。对内对外都称《红旗》八组，因为先前《红旗》杂志编辑部已经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农村、文艺、国际和哲学史等七个编辑组。当时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在沙滩北大红楼后面同一幢大楼里办公。

《内部未定稿》的负责人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他因此也兼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日常工作由同时担任《红旗》杂志和《内部未定稿》编委的张先畴负责。《红旗》杂志并不过问《内部未定稿》的编辑工作。和我同时来的，还有八个分别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来的当年毕业生，包括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和新闻几个专业。在我们之前调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孙决，革命烈士孙炳文之子，早年留学日本，当过朱德的秘书，是来做《内部未定稿》专职编委的，但不久就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革”中死于非命；另一个是中央编译局的余征，懂俄文，在那里译校马列著作，此前已借调在新华社从事中苏论战的资料编译工作，是许立群点名调到《内部未定稿》来的（许立群当时兼任着中央编译局局长）。

当时正大张旗鼓开展“四清”运动，过了国庆节我们都随《红旗》杂志社机关大队人马到北京通县农村搞“四清”，张先畴独自留守。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秋天张先畴和八组的多数人去广西农村和北京的工厂参加“四清”。这样许立群就更多地直接管《内部未定稿》的事，刊发的所有稿件都是他亲自定的，具体工作由余征和我们留下来的几个人做，他很放手。我对许立群一向怀有敬意。记得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时，他应邀到北大作报告，开口便说：“要读原著，辅导报告是学习心得，都不如原著好。”转而又说：“也有例外。列宁的《哲学笔记》就比许多原著好。”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机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听说1951年批判《武训传》的时候，许立群的一篇文章^[1]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找他面谈，给予

[1] 即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载于《文艺报》1951年第2期。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标题改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许时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耳是他的笔名。



表扬和鼓励。这像是传奇故事，我问过他的夫人杜晓彬（曾任《红旗》杂志机关党委副书记，“文革”中我们一起下放“五七干校”多年），竟确有其事，她在晚年写的回忆许立群的文章里，详细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1]我“四清”回来后在许立群领导下工作，对他的明快严实的工作作风与平易随和的对人态度感触很深。他说话没有官腔，在院子里碰到我们还常常主动停下来闲聊几句。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酝酿期，思想理论领域气氛日益紧张，许立群作为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工作很难做。在《内部未定稿》的编辑出版方面，也表现出他的犹疑和彷徨，以及为争取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所做的努力。

当时国际共运除中苏论战外，还发生过其他一些大事。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被害，苏加诺总统被软禁。这件事在我国引起了强烈关注。许立群说，苏加诺态度软弱，有点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的汪精卫，让我们搞一份汪精卫在“四一二”前后的言论摘编，发表在当年12月8日出版的第4期《内部未定稿》上，标题是：“汪精卫在‘四一二’前后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副标题是：“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参考资料”。“编者按”说：“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反面教员。本刊发表他的这一材料，值得认真一读。因为，过去的历史事变固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它所提供的经验，却是绝不可忽视的。”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他试图把思想理论领域简单上纲的政治批判，引向深入讨论历史经验教训的一种努力。

1966年1月5日出版的第1期《内部未定稿》，刊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舒芜等人搞的《〈水浒〉评注本一至六回样稿》。“编者按”说：“帮助他们把这第一次开始实验的工作做好，关系到古典文学遗产研究如何批判地继承的问题，欢迎大家来稿讨论。”还刊出了评注者关于评注意图、原则和方法的说明。现在看来，这样的评注工作，不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即使在当时，也看不出有什么违碍之处，完全可以公开出版，而不必在《内部未定稿》这样的刊物上发表。这或许也反映了许立群在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文章发表之后，彷徨不知所措而又试图在开展学术研究方面有所作为的努力。记得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参加中宣部理论处的学习讨论会，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不满。

1966年2月，许立群调正在北京第二机床厂搞“四清”的苏星回来，主持在《内部未定稿》批判孙冶方。苏星是《红旗》杂志经济组组长，也是《内部未定稿》的编委。批判孙冶方此前已经由中宣部有关方面负责组织进行着，苏星只是负责在《内部未定

[1] 杜晓彬：《一生忠贞，英灵不泯——回忆许立群》，载于《许立群文集》下卷，第85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出版。

稿》组织发表批判文章。苏星主持编了两期，在3月15日出版的第2期没有发别的文章，只是全文刊发了孙冶方的四篇文章。苏星写的“编者按”说：“孙冶方同志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经济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本刊准备自下一期起陆续发表讨论文章，希望大家积极参加这个讨论。”当时正传达《二月提纲》（即《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苏星所主持的批判是按《提纲》的精神进行的。在当时“文革”已经风起云涌，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还能够用一整本刊物全文刊登被批判者的文章而不是断章取义，“编者按”语气也比较温和，已属不易。4月12日出版的第3期，刊登了两篇孙冶方所在的经济研究所的两篇批判文章，同时也全文刊发了孙冶方过去发表的一篇文章。^[1]《内部未定稿》的这种批判没有进行下去，因为很快就有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接着就是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许立群是彭真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2]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又是彭真所主持的《二月提纲》的起草者。他首当其冲，被批判斗争，不久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内部未定稿》因为是许立群主持，被指责为“以反修之名宣传修正主义”，宣布停刊。苏星所主持的《内部未定稿》对孙冶方的批判被指责为假批判、真包庇。^[3]《红旗》八组被解散，人员分别划入其他几个编辑组。张先畴被从广西叫回来接受揭发批判，曾有诗自嘲曰：“十年一觉京华梦，赢得红楼黑帮名。”

《内部未定稿》刊名五个字，集自魏碑。1964年4月创刊，1966年4月停刊，总共出版12期：1964年5期，1965年4期，1966年3期。不定期出版，每期篇幅也不确定，甚至只发一篇文章。总共发表文章和资料32篇。正式出版前在1964年4月出版过两期“试版”，所载5篇文章和1篇资料，正式出版时分别在第1期和第3期刊发了。

这32篇文章和资料，大部分是和苏联论战的，批判“物质刺激论”，批判“全民国家论”，还有关于历史观和国际形势等方面的批判文章。这合乎当时办刊的宗旨。这种批判，正如邓小平20多年后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的，“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4]也有些文章，因为有比较扎实的研究和分析，现在看来也还是有价值的。例如历史学家蔡美彪的《关

[1] 苏星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有翔实记载，见《我的理论生涯》，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83页。

[2]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文化部整风时成立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3] 苏星：《我的理论生涯》，第183页。

[4]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91～295页。



于“黄祸论”的历史考察》(1964年第1期),考察了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编造“黄祸论”的历史,批判了苏联营垒的一些人重拾这种谬论对中国的攻击。又如《驳苏联修正主义考古学者的谬论——批判 И.С. 瓦西里耶夫〈关于外因影响在中国文明发生中的作用〉》(1966年第1期),用考古发现的确凿事实,驳斥了苏联学者以及长期以来欧洲一些学者编造的中国石器时代文化“西来说”。这种错误观点当然不一定要戴“修正主义”的帽子,但据理驳斥是必要的。这篇文章,是考古学家夏鼐主持写作的,我们到考古研究所找夏鼐商谈定稿事宜,他临时署了个化名“文晋臣”,含义现在已经记不起了,似乎是从几个比较年轻的执笔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的。又如语言学家傅懋勳的《评兹维金采夫的阶级语言论》(1965年第3期),在国内“阶级斗争”声浪日益高涨的条件下坚持语言没有阶级性;《红旗》杂志哲学组副组长朱波的《形式逻辑有阶级性吗?》(1965年第4期),坚持形式逻辑是推理形式而不具阶级性。文艺理论家朱光潜的《谈古为今用,外为中用》(1965年第4期),也是深入进行学术讨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肯定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一个成功典范,同时也指出:“这种舞步是否适合《红色娘子军》的革命斗争的情节和情调,还值得商讨。”当时说这样的话是需要胆量的。在文学艺术方面,有郭沫若解读毛泽东诗词的两篇文章:《梅花欢喜漫天雪》和《五洲震荡风雷激》(1964年第2期)。赵朴初的《散曲两首》(1964年第3期),最早是许立群拿来在《内部未定稿》发表的,不胫而走,万口相传,为讽刺诗之杰作。赫鲁晓夫下台后赵又作一首《哭自己》,以《某公三哭》为题公开发表,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刊发这些文章,当然也反映着许立群的办刊思想,以及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内部未定稿》是当时形势的产物,时局的变化也决定着它的命运。以交流和通报情况为宗旨的内部刊物和简报历来不少,但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由党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刊物这样两个权威机构共同主办这样一个内部理论刊物,以后再没有过,此前也不曾听说有过。现在社会信息日益公开透明,内部刊物似乎并不怎么为人所重视,但《内部未定稿》创办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内部未定稿》的缘起是,1963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试办内部刊物的通知》,决定中央试办一个内部刊物。根据中央的决定,1964年2月6日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试办反修内部刊物的请示》,经中央批准实施。同年4月24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出版〈内部未定稿〉的通知》。根据《请示》和《通知》的规定,刊物内容“主要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发表理论方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文章的未定稿。同时,也可发表一些研究现实问题的文

章”。当时的设想是，除《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外，中央一级报刊发表的反修文章，一般要先在这个刊物发表，以便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不宜或暂时不宜在报刊公开登载的反修文章，不宜公开或不够成熟的有价值的研究文章或者有理论意义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可以在这个刊物上登载。每期印1万份。发行面比较宽，有关领导干部可以订阅，党内外学术工作者也可以订阅，不限级别，但订阅名单须经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中央机关则由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订阅费半年1元，一年2元，不零售，由新华社在《内部参考》发行系统代发。中央的内部刊物订阅不限级别，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根据中央《通知》的规定，由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等单位共同组成刊物领导小组，负责对中央一级报刊发表反修文章的审批和掌握，同时负责对反修内部刊物的领导。领导小组由周扬、胡绳、邓力群、范若愚、林默涵、许立群、姚溱、关锋、于光远等九人组成，周扬任组长。《内部未定稿》组成阵容宏大的编委会，除前述许立群、张先畴、孙泱和苏星外，还有刘汉（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陈道（中宣部理论处处长）、林润青（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袁水拍（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赵正晶（中宣部国际处副处长）、姚洛（《红旗》杂志国际组组长）、王惠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吉伟青（《新建设》杂志主编）、林聿时（《哲学研究》杂志主编）、黎澍（《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秦柳方（《经济研究》杂志主编）、毛星（《文学评论》杂志主编）、张光年（《文艺报》主编）、刘思慕（《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主编）、穆欣（《光明日报》总编）。编委会的组成，包括了思想理论主管部门，以及哲学社会科学、文艺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权威刊物的领导，人物都是一时之选。中央决定创办这个刊物，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这样的权威机构向中央提出详细的办刊方案，以及领导小组和编委会的宏大阵容，都说明中央对这个刊物的重视，寄予很高的期望，是想把它作为开展中苏论战和国内思想理论领域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有所作为的。

实际上《内部未定稿》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甚至从创办之初就举步维艰，不大好办。根本原因，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内部未定稿》正式创刊的时候，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已经发表，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就是被广泛简称为“九评”的，已经发表了八篇，第九篇也于创刊不久的1964年7月发表，中苏分歧和争论已经完全公开，两党和两国关系近乎完全破裂。中苏论战公开表现为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其根源和实质则多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中国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立场是完全正义的，但现在看来，当时对苏联国内为搞活经济而采取的改良政策的批评，例如对所谓“物质刺激原则”和“利润原则”的批评，



则带有非常激进的“左”的倾向。这种“反修斗争”更促进了国内本已存在的普遍“左”倾，“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1965年初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中央核心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日渐暴露，一场大的政治动荡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外，都不再有通过内部刊物深入讨论问题的环境，也不再有这种需要。学术界风声鹤唳，敢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少，组稿越来越困难。至于许立群本人，更因为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而处于越来越为难和被动的地位，惶惶不可终日。《内部未定稿》本来设想一年出一二十期，结果前后三个年头，整整两年时间，总共才出12期。阵容宏大的编委会，更是一次也没有开过。虎头而蛇尾，在“文革”发动期即被停刊，是势所必然。一个刊物的命运，就是这样和国内政治大局以及国际形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这份内部刊物的名称，在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向中央书记处的请示报告中，曾经设想过采用“内部未定稿”或者“内部资料”、“内部文稿”。在酝酿过程中还设想过采用“锻炼”或“反修未定稿”的刊名。余征告诉我，采用“内部未定稿”这个刊名，是许立群的主张。许立群说，这样有几层保险，可以不被抓辫子：第一，是内部的，非公开的；第二，是未定的，研究讨论之中的；第三，还只是一个稿子，可以说是草稿，更突出其未定性。当然“稿”也可以是定稿，例如陆游的《剑南诗稿》。许立群的这种机智，让我立即联想到他在北大的那场报告。

《内部未定稿》存在时间不长，刊期不多，但毕竟是党刊史特别是内部理论刊物史研究的一份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文革”前史的一份重要材料。这份刊物可能现在世间已经罕有保存，余征保存有完整的一套，捐献给了图书馆。我托一位朋友从图书馆借到，得以在将近半个世纪后重新看到《内部未定稿》的全部，读之恍如隔世，也不免多有感慨。

关于由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主办的这份《内部未定稿》，至今没有稍为详细的记述。^[1]我的这些拉杂散漫的回忆，或许可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1]就我见闻所及，只有苏星的《我的理论生涯》和苗作斌的《红旗风云》（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提及《内部未定稿》。

“外来和尚会念经”背后的经济学 / 蒲勇健

“外来和尚会念经”，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是一句老话。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它仍然是人们所经常遇到的尴尬。不是吗！就拿我本人来说，我在本单位为EBMA上课已有10年了，一直都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但是，我得到的授课费可远远低于来自校外的教授。一些“海归”来授课，他们得到的待遇最高可是我的10倍左右。这么多年来，我的授课长期得到同学们的高度评价，至少授课的效果和水平在平均水平以上吧，但是，授课费可一直在平均水平以下。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亏待还不仅仅是对于我一个人，对于外来和尚来说，也存在着更加细分的歧视。比如，国外的教授授课费高于国内的，正宗的洋人授课费高于假洋鬼子的华裔教授……也就是说，离咱们中国越远，离咱们中国人越远，得到的授课费就越高。其实，我从学生的反映那里也知道，许多（甚至是大多数的）洋鬼子授课效果比许多假洋鬼子差，而许多假洋鬼子的授课效果要比咱们土鳖差。这就是说，为EMBA授课的教授待遇，基本上是与授课效果和质量成反比的！

这种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现象，也不仅仅出现在我所在的单位。其实，在国内的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差不多如此。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因呢？难道经济学的规律——价值规律在这里就失灵了吗？如果价值规律在这里是例外，那么，原因是什么？我想，这是人们所关注的。

萨缪尔森在他享誉全球的《经济学》中写道：如果鹦鹉会说供求，她就成了经济学家。

是的，对于经济学现象的剖析，我们离不开供求分析。特别的是，对于价格现象，就更需要使用供求工具了。

我们首先从需求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个单位，邀请某人来授课，这是需求。供给来自不同的范围，一是本单位的人也可以授课，二是本单位之外的人员可以授课。本单位的人员与外单位人员的供给成本是不同的，他们的保留效用也不一样。

对于本单位的教授，其供应成本较低，因为，与外来者相比较，他比较熟悉本单位的听众更加喜欢什么样的授课内容和授



课风格，也不需要长途往来的舟车劳顿，授课的准备工作没有外来者那么辛苦。另外，通过给本校的学生授课，有助于在本校学生心目中树立偶像地位，这种偶像地位因为是在本校学生心目中留存着的，有利于未来在与本校学生的长期往来中取得较高的预期收益，而这种预期收益将成为为本校学生授课的一种额外收益，它会把一部分成本抵消掉，导致供应成本较之外来者更加低一些。对于外来者来说，尽管授课也会在学生心目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外来者与本校学生在未来的长期交往机会要少一些，预测这种影响的未来收益也要小一些。

在讨价还价中，邀请方最为理想的谈判结果是只付给教授保留效用水平的授课价格。当授课费严重低于教授的保留效用水平时，教授就会拒绝授课。一般来说，外来者的保留效用会高于本单位教授的保留效用。这是因为，外来者授课会占用他们在本单位的工作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本职工作。完成这样的本职工作会带给他们一定的效用，而占用这样的本职工作时间用于到外单位演讲，他们需要获得一定的报酬带给他们的边际效用就一定要大于等于这种效用，就是保留效用。但是，对于本单位的教授来说，为本单位的学生授课本来就是教授本职工作，不会带来额外的机会成本，所以保留效用就较小甚至为零！这样一来，我们看到，本单

位的教授与外来者相比较，为本单位学生授课的供给成本就要小一些。给定同样的需求曲线，来自本单位的教授的授课价格当然就会小于“外来和尚”的了！这是因为，在同样的需求曲线下，较低成本对应于较低位置的供给曲线，而较低的供给曲线就一定带来较低的均衡价格。

还有，对于外来和尚会念经这种现象，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理由加以解释——这就是领导的偏好！

在某些单位，部分领导并不喜欢本单位的一些能干的人员，特别是基于嫉妒的，害怕竞争的考虑，他们不会把在本单位露脸的机会给予本单位的那些人——即使本单位的那些人完全胜任授课的任务！同时，某些领导还可以通过给予外来者的服务高价格的方法来向外界传播其个人权力的信息，对外拉关系，有利于自己在本单位之外的社会甚至国内外圈内圈外树立个人地位。反正邀请谁来授课是领导说了算的。

这样，我们看到，再加上这些因素，外来者在服务的价格上与本单位的竞争者相比较，当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了。

这是需求侧的特点。因为这种领导偏好，对于邀请外来者授课的需求曲线要高于邀请本单位教授授课的需求曲线。

综合上述，我们看到，较高的供给曲线和较高的需求曲线，使得外来者获得的授课费要高于本单位的教授，就是经济学

中的供求分析所必然得到的结论了。从需求的角度分析,我们还有几个方面的理由说明本单位对于外来和尚的需求要比对于本单位人员的需求高。其一是,领导对于本单位人员要了解一些,而在讨价还价中,对于比较了解的谈判对手,就容易掌握对方的价格底线,在谈判中就能够最大程度压低价格,把对方的要价逼到底线上。所以,本单位人员在与本单位领导就授课费的讨价还价中,就处于不利地位,价格高不起来。相反,对于外来者,领导在谈判中不清楚对方的价格底线,就难以把价格压低到对方的底线,因为,领导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

其二,领导对于外来者的保留效用存在较本单位人员较大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在谈判中难以把价格定在较低的水平,即使对方的价格底线或者保留效用较低也如此的

其三,根据行为经济学,领导也是人,

所以也会具有普通人的缺点,即存在嫉妒或者相对收入效用。这意味着,领导把高额授课费给予自己的单位的其他人,他自己因为相对收入下降而导致效用下降,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对于外来者来说,这种相对收入的对比是看不见的,所以也就没有这种效应。

第四,也许本单位的学生或者员工对于外来者具有新鲜感,即使外来者的授课内容一般般,但是这也让本单位的人员知道了外来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好奇心的满足也会使得本单位开出较高的价格。这种偏好导致本单位对于外来者有着较本单位教授更高的需求曲线。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看到,“外来和尚”念经其实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中还包括行为经济学涉及的某些理由。

(作者系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的 师生问答（一） / 俞炜华 王长龙

编者按：本文是西安交通大学俞炜华副教授和学生就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的问答，反映俞炜华博士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因全文较长，《茶座》将分3辑刊登该文。

近几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如何调整成为社会热点，2012年10月底11月初，网上连续出现两篇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一篇介绍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该报告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中国应废止独生子女政策，放开二胎政策”，并提出分两步走，到2015年全面实现放开二胎的目标。另一篇引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的观点，认为中国“放开二胎政策，百害而无一利”。

针对计划生育政策及其调整，在《财政学》课后，师生间发生了一场对话。

（一）

生：老师，为什么我国会在1970年代末以来会实行如何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师：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第一，经过十年“文革”，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就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为此，党和政府采取诸多措施重建统治的合法性，如清算极左势力是重建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将经济发展不良归因于我国人口基数过大（过去鼓励生育）造成的人均资源过低等，并计划通过控制人口实现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

第二，在国际学术界，对未来悲观的马尔萨斯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如罗马俱乐部等，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对未来资源悲观的观点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生：在我国古代的朝代兴衰和更迭周期中，有一个重要变量是“人地比”，在“人地比”过大时，就会出现内乱，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人地比是